



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 范 岚 著

7—14世纪

中日文化交流 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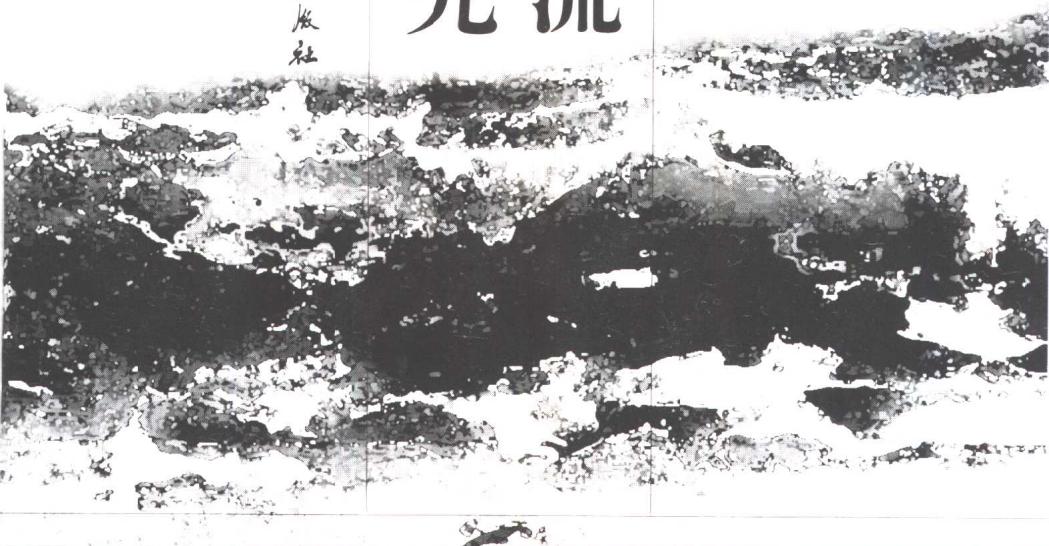
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 范 岚 著

7-14世纪

中日文化交流 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7~14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苌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1

(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ISBN 7-5004-3191-0

I . 7… II . 羌… III . ①出土文物-研究-中国②中日交流-研究-古代 IV . K8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440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河北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

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它比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其他专题更为复杂和困难一些，除了掌握中国的考古资料外，还要掌握与中国在文化上有交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考古资料。其研究的内容可分两方面：一是研究中国境内发现的外国遗物；二是研究在国外发现的中国遗物。这两方面合起来才能构成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一般来说，研究中国境内发现的外国遗物在搜集资料上稍方便些，但在判断外国遗物的国别和地区、年代，以及它的内涵和意义时，对中国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在研究国外发现的中国遗物时，其情形却恰恰相反，搜集资料很困难，判断中国遗物的年代和内涵时则比较容易。苌岚所作的博士论文正是属于研究国外发现的中国遗物的范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便有很深的文化关系，中日两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研究基础，但是，从考古学上研究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却起步很晚。1957年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在北京作《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关系》的讲演，第一次论述这个问题。80年代以后，中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讨论了关于在日本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引起了日本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极大震动。其后，又讨论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飞鸟、奈良和平安期都城规划的影响问题。稻作如何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苌岚的博士论文便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当时我想，一个刚刚进入学术界的青年学

子不必要介入那些热门课题，特别是尚有争议的课题；更不要选择那些资料尚不具备作专题研究的课题。因此，我给她规定了在她的论文中不涉及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问题，也不涉及佛教传入日本和日本佛寺平面布局的渊源问题。仅限定于从近年日本各地出土的7—14世纪的中国遗物，如陶瓷器、漆器、铜镜、铜钱，以及日本经冢中出土的中国遗物。这些研究的内容，直接与这个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有关，考古学的发现是最能反映当时历史实况的。

考古学研究重在实证。裘岚的论文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她所掌握的日本发现的这个时期的中国遗物，能否在客观上说明当时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实况。为此，我要衷心地感谢日本驹泽大学饭岛武次先生，没有他的指导和协助，裘岚不可能完成她的论文。日本考古学界的各位先生和有关单位，都毫无保留地提供了裘岚论文所要的资料。书中有很多资料是第一次在中国披露。裘岚根据这些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7—14世纪中日之间交流关系的三个阶段，即遣唐使阶段、鸿胪馆阶段和博多阶段；对这三个阶段中日之间的交通路线也作了研究；还对中日商品影响某些日本产业的情况和在博多居留的宋朝商人的情况作了论述。

裘岚在论文答辩通过以后，又根据答辩委员所提出的意见，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现在这本书即将正式出版了，我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有责任在书前说几句话。我觉得裘岚的这篇论文，是把7—14世纪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资料，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进行了初步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对我们今后研究中日古代关系史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徐苹芳 2001年3月13日
序于北京东四九条新屋

序二

苌岚女士作为1995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学生，在驹泽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的基础研究，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因我担任她的指导老师，因此为之作序。

自公元前3世纪弥生时代以来，众多的文物从中国传到日本，最早传来的是起源于中国的青铜器和铁器，公元1世纪中叶，日本使节来到洛阳，并接受光武帝赐与的金印。进入7世纪，中日建立了真正的外交关系，日本屡派遣隋·唐使到中国，他们的往来在政治方面使唐的律令制度，在宗教方面使佛教传播到日本，遣隋·唐使不但将陶瓷器、玻璃制品、漆器、经典、佛像等大批文物携回国，更将其生产技术传入。到9世纪前期，遣唐使制度废止，开始了与宋的交往，佛教僧侣带动的文化交流日盛，此时期的贸易与交流将大量越州窑瓷器以及铜钱等运到了日本。13世纪发生元朝军队远征日本，14世纪镰仓幕府灭亡。

苌岚的博士论文对7—14世纪日本出土的中国唐三彩、越州窑系青瓷、定窑系白瓷、长沙窑系陶瓷、龙泉窑青瓷、铜钱、铜镜等遗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本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重点加以研究。在日本，很早就有对遣隋·唐使的文献史料研究，但对于他们带回的出土文物的研究甚少。近年来，在京都（平安京）、福冈（太宰府）、镰仓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资料的增加，使考古学研究成为可能，被称为陶瓷器出口国的日本开始生产瓷器是在17世纪后期以后，在此之前一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

陶瓷器。7—14世纪中国出口日本的陶瓷器在日本称之为贸易陶瓷，近年来的研究非常热烈。但是，尚没有对7—14世纪日本出土中国文物进行整体地系统地研究的论文，此方面的论文及著作在中国也未得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开辟了前人尚未涉及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特别本书中裴岚作成的唐三彩出土地名表，越州窑系青瓷、定窑系白瓷出土地名表，龙泉窑同安窑系青瓷出土地名表，中国铜钱出土地名表，唐镜出土地名表等各种遗址地名表，不仅在本书中，也对研究者同仁有极高利用价值。

本书对唐、北宋时期的城市建设及寺院伽蓝营造技术是由遣唐使、僧侣传到日本的事实进行了介绍。再次论证在与唐同样的律令体制下建成的藤原京（飞鸟）、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是学习唐长安的建制而设计的。明确日本的四天王寺、药师寺、大安寺、东大寺、建长寺、东福寺等的寺院伽蓝是学习中国北魏以来的永宁寺和大相国寺的寺院布局和营造技术的。这些事实在日本较为认知，但中国考古学者踏着日本的遗址确认本国的技术传至日本可以说是第一次。

本书应予以高度评价，尤其以中文出版发行可使中国人对传至日本的中国文物、技术的博大，以及日本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文物、技术的影响有所理解。

日本 驹泽大学教授 饭岛武次

目 录

序一	徐莘芳 (1)
序二.....	[日] 饭岛武次 (3)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回顾.....	(1)
一 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	(1)
二 中国学者的研究现状.....	(7)
第二节 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内容与目的	(11)
第二章 日本出土的7—14世纪中国遗物	(14)
第一节 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14)
一 唐三彩与绞胎陶器	(14)
二 越州窑系青瓷、邢·定窑系白瓷与长沙窑陶瓷.....	(24)
三 南方白瓷、龙泉·同安窑系青瓷、景德镇青白瓷 系及其他	(71)
第二节 日本出土的中国铜钱.....	(107)
一 九州地方	(110)
二 中国地方	(112)
三 四国地方	(115)
四 近畿地方	(117)
五 中部地方	(119)
六 关东地方	(123)
七 东北地方	(126)

第三节 日本出土的和日本寺社传世的唐宋铜镜………	(135)
一 日本发现的唐代铜镜……………	(136)
二 日本发现的宋湖州镜……………	(148)
第四节 日本发现的中国宋元漆器………	(172)
第三章 出土遗物所反映的7—14世纪中日贸易、文化 交流发展阶段 ……………	(182)
第一节 遣隋·唐使贸易与文化交流 ……	(182)
一 遣隋·唐使的派遣和使命 ……	(183)
二 遣唐使的朝贡贸易……………	(189)
三 遣隋·唐使和以律令制都城建设为主的文化 交流……………	(191)
四 遣唐使末期的新情况……………	(199)
第二节 鸿胪馆贸易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205)
一 鸿胪馆历史使命之变迁……………	(206)
二 鸿胪馆贸易……………	(211)
三 鸿胪馆贸易时期文化交流之考古研究……………	(223)
第三节 博多贸易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231)
一 博多贸易的历史背景……………	(231)
二 博多贸易……………	(235)
三 博多贸易时期文化交流之考古研究……………	(252)
第四章 中日文化交流诸问题的探讨 ……………	(260)
第一节 中日文化交流交通路……………	(260)
一 遣隋·唐使交通路 ……	(261)
二 鸿胪馆贸易时期交通路……………	(264)
三 博多贸易时期交通路……………	(269)
第二节 贸易商品对日本产业的影响……………	(274)
一 日本陶业界的变化……………	(274)
二 金属加工业的变化……………	(280)

第三节	关于博多居留宋人	(286)
一	博多“宋人百堂”之形成	(286)
二	博多居留宋人的活动	(291)
第四节	僧侣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	(298)
一	遣隋·唐使时期僧侣专注于佛教文物制度的 传入	(300)
二	宋元时期僧侣活动多姿多彩	(308)
	结语	(321)
	中文参考书目	(323)
	日文参考书目	(325)
	后记	(329)
	图	(33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 的考古学研究回顾

一 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

战前，日本学者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华北做了不少考古调查工作，^①从追寻日本文化源流着眼，将研究重点放在汉以前遗迹、遗物方面。本国的调查也以古坟等为主。所谓历史时代的遗迹、遗物只不过是因偶然的发现而成为调查对象。例如，大正十二年，奈良县高市郡船仓町松山古坟发现一面海兽葡萄镜（梅原末治调查）。大正十四年，岐阜县可儿郡长瀬山古坟出土伯牙弹琴镜（森本六尔调查）。大正十二年，比睿山横川经冢出土铜塔、经筒及其他较多的奉纳品。大正四年，中山平次郎对福冈县高取烧窑址的调查是最早的窑址调查事例。昭和十一年四月，帝室博物馆综合展出了奈良时代出土文物，昭和十二年刊行介绍展出资料的《天平地宝》，书中石田茂作所撰《从出土品看奈良时代的文化》一文，初次揭示了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中包括日本发现的唐代文物。战前，对日本都城建制的研究可以说是中

^① 以大正五年（1916）秋，关野贞调查朝鲜总督府为始。此后陆续调查发掘了乐浪古坟群、金海贝冢、庆州金冠冢等。昭和八年（1933），伪满洲国成立，滨田、梅原、原田等人调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渤海上京龙泉府、通沟古坟群等。

日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以关野贞和喜田贞吉为带头人，首先提出了日本都城的源流在隋唐长安城。^①

战后不久，出版了一些从历史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著作。当首推木宫彦泰的《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年），森克己的《日宋贸易研究》（国立书院，昭和二十三年五月）和《日宋文化交流诸问题》（刀江书院，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以及曾我部静雄的《日宋金货币交流史》（宝文馆，昭和二十四年六月）等。这些著作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有极大帮助。

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的研究虽落后于史学的研究，但是，随着全国考古调查的蓬勃开展，历史时代遗迹调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朗化。岩手县胆泽城址、宫城县多贺城址等地方城栅、官衙；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长冈京、平安京等都城、宫殿；墓葬、寺院等祭祀性质遗址；还有中世村落、城馆如富山县草户千轩、福井县一乘谷朝仓氏遗址、冲绳的豪族城堡等各种性质的历史时代遗迹的调查引人注目。这些历史时代遗迹出土大量历史时代遗物中最多见的是土器片、陶瓷片，这使须惠器、土师器的编年研究以及猿投窑中世古窑的调查得以进展。六七十年代以后，日本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将历史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推进了一步。1968年7月，北海道函馆市志海苔町的道

^① 关野贞：《平城京及大内里考》，《东京帝国大学纪要工科第三册》，明治十年六月。

喜田贞吉：《帝都》，日本学术普及会，昭和十四年。

关野贞比较了平城京与长安城的相异处，以平城京南北纵长，大小同一的方形坊，坊的称呼以数字（×条×坊×坪）等不同于唐长安城之处，认为平城京不是单纯模仿长安城，而是有所创新的。喜田贞吉从平安京坊名多取自西京洛阳坊名，认为平城、平安两京也必定参考了洛阳制度。同时认为难波宫是日本第一都城，并且可能实行复都制。在《帝都》一书中，由于昭和九年日本古文化研究所对藤原宫遗迹所进行的科学发掘，收录了不少关于藤原宫、历代宫都综合研究论文。

路扩建工程中，偶然发现 3 个装满了铜钱的大瓮，出土的 374 436 枚古钱中，几乎都是中国铜钱，有前汉的四铢半两、新莽货泉、唐开元通宝、五代十国铜钱，北宋、南宋钱占绝对量，还有辽、西夏、金、元、明各代铜钱，高丽、越南及日本皇朝十二钱仅有 72 枚。^① 类似这种大量备蓄钱的发现例子，以后屡见不鲜。铜钱贸易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 年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高松冢古坟的发现，是战后日本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壁画题材及出土的一面海兽葡萄镜成为奈良时代日唐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② 1998 年初，同在奈良明日香村用超微型摄像机观察 KITORA 古坟，发现四神及星宿壁画，是日本发现的第二例壁画古坟，成为又一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材料。^③ 1977 年，随着全国地铁的建设，博多站筑港线的拓展工程，出土大量中国陶瓷，以后每年随公共事业的开展不断进行发掘调查工作，到目前已进行有百余次。中世纪贸易都市博多的考古工作，揭示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象。1987 年 12 月，伴随着福冈市平和棒球场的改造工程，考古学上第一次发现了鸿胪馆相关遗迹，确定了历史上作为文化交流重要舞台的鸿胪馆的所在地。每年持续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无以数计的以中国唐五代陶瓷为主的众多遗物，至今对其出土

① 市立函馆博物馆·函馆市教育委员会：《函馆志海苔古钱——北海道中世备蓄古钱の报告书》，1973 年。

② 末永雅雄、井上光贞编著：《高松冢壁画古坟》，朝日新闻社，昭和四十七年。

高松冢壁画完全不同于日本其他古坟壁画，是中国唐墓壁画及朝鲜高句丽古坟壁画所常见的中国墓室壁画主题“四神图”、“人物风俗图”。墓内出土海兽葡萄镜一面，曾认为是西安十里铺出土镜的同范镜。王仲殊认为此镜与西安东郊唐独孤思贞墓出土镜属同范镜。（王仲殊《关于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考古》82—4）

③ 《四神·星宿何语る——キトラ古坟专门家座谈会》，《朝日新闻》1998 年 3 月 7 日。

陶瓷具体数字仍无法作出统计。

考古调查发掘广泛进行，历史时代遗迹中不断出土大批中国文物，已经有不少日本学者对这些中国遗物如陶瓷、铜镜、铜钱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陶瓷贸易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学者在中近东的考古调查发掘中，由于屡屡发现混有中国陶瓷，从而注意到的。日本，最早是中山平次郎于北九州采集陶片及镰仓海岸发现青瓷片，表示日本贸易陶瓷研究的起点。30 年代，小山富士夫、藤冈了一等陶瓷研究者开始对各地遗物进行调查，镰仓芳太郎等对冲绳出土陶瓷的调查也进行不辍，给贸易陶瓷研究打下了基础。战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各地发现大量中国陶瓷等文物。1975 年，在全国考古学者的大力支持下，东京国立博物馆主持“日本出土中国陶瓷展”，以中国古窑址调查成果为背景，展示了日本全国古代、中世、近代遗迹出土的大量陶瓷片及遗物，将贸易陶瓷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阶段。翌年，韩国新安海底沉船遗物的发现更有助于中国贸易陶瓷外销东北亚的研究。1978 年，香港中文大学主持召开“东亚及东南亚贸易陶瓷研讨会”，东南亚诸国及欧美的许多研究者出席，是互相交换意见、交流成果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大会。在日益高涨的研究形势下，1979 年 9 月，以三上次男为代表的“贸易陶瓷研究会”成立，从 1980 年第一次集会开始，每年一次讨论会，发表各地的新出资料及最新研究成果，并将会议内容刊载于会刊《贸易陶瓷研究》，这标志着日本贸易陶瓷研究的成熟。三上次男关于贸易陶瓷的研究成果集中收录于《贸易陶瓷史研究》（上·中·下三册），由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于昭和六十二年出版，贸易陶瓷研究的后起之秀龟井明德于 1986 年出版《日本贸易陶瓷史研究》（同朋舍出版），他们代表了日本贸易陶瓷研究的最高水平。龟井明德将贸易商客划分为“遣唐船贸易”、“波打际贸易”、“住蕃贸易”三个阶段。以全面

收录出土贸易陶瓷为主的著述，除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外，1984年，奈良县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以其春季特别展览出版发行了《奈良·平安的中国陶瓷——以西日本出土品为中心》，对“初期贸易陶瓷”首次进行综述。最近，该研究所土桥理子在其研究基础上，收集全国各地奈良·平安前期遗迹出土的贸易陶瓷，编著出版《贸易陶瓷——奈良·平安的中国陶瓷》一部大作（平成五年六月），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日本学者在贸易陶瓷的资料收集、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另一方面，在出土中国唐宋铜镜的研究上，由于数量有限，远没有贸易陶瓷，也没有日本出土汉魏铜镜的研究热烈和成果卓著。唐镜的综合性研究可以后藤守一《本邦出土的唐式镜》^① 为代表，共记录了31处遗址出土的48面唐式镜。中野政树的《奈良时代的镜子——唐样式镜资料》^② 按工艺、背纹将唐式镜分为涂金銀平脱或螺钿背、海兽葡萄等16种样式。梅原末治的《唐镜大观》（同朋社昭和五十九年）也收集一些日本出土唐镜。最早注意到日本出土湖州镜的学者是矢岛恭介，他的《有湖州并浙江诸州铭文的南宋时代铜镜之讨论》^③（《考古学杂志》34—12，昭和二十二年），至今仍是奠定基础研究的著作，它记述当时日本17个地点出土的湖州镜，分析湖州镜的传入年代，通过镜铭对湖州镜的铸造商家、镜的形式做了相关探讨。

关于出土贸易铜钱的考古研究，虽早在30年代就有人田整

① 后藤守一：《本邦出土の唐式鏡》，《考古学杂志》21—12，昭和六年。

② 中野政树：《奈良時代の鏡子——唐样式鏡の資料》，《MUSEUM》141号1962年12月。

③ 矢岛恭介：《湖州并に浙江諸州の銘ある南宋時代の鏡に就て》，《考古学杂志》34—12，昭和二十二年。

三发表《对发掘钱的考察》^①，但是，广泛的研究直到80年代才展开，《考古学ジャーナル》187号（1981）、249号（1985）作为出土“渡来钱”特辑，^②对各地出土铜钱结合历史做了说明，就出土“渡来钱”的诸问题加以探讨，尤其注重备蓄钱的分布、分期，也涉及到“岛钱”等模铸钱问题。铃木公雄的《出土备蓄钱和中世后期的钱币流通》^③代表了日本学术界对出土贸易铜钱的最高研究成果，文中收录了至1991年全国152件备蓄钱例总共228万枚“渡来钱”，将之划分为8期，就地域分布、钱种比例都作出了精确统计。在出土“渡来钱”研究日臻成熟的情况下，1993年8月，“出土钱货研究会”成立。^④最近，兵库县埋藏钱调查委员会出版了一部关于出土“渡来钱”的资料集成著作，《中世的出土钱——出土钱的调查和分类》及其续编《中世的出土钱补遗Ⅰ》^⑤，共介绍全国50件大量出土钱例。每一例都单独列出出土钱一览表并解说出土状况，书中还揭载了古钱拓片，收录了围绕出土贸易铜钱所做的最新调查报告。

出土贸易陶瓷、唐宋铜镜、贸易铜钱都是7—14世纪中日贸

① 入田整三：《发掘钱についての考察》，《考古学杂志》20—12，1930年。

总结全国出土18件备蓄钱例。其后，又有矢岛恭介在《日本考古学讲座》7（河出书房，1956年）揭示了全国21例备蓄钱的钱种及枚数一览表，《货币——本邦における出土钱货》一文中将出土钱划分为三期。

② 1986年由坂诘秀一主编为《出土渡来钱——中世》单行本出版，ニューサイエンス社。

③ 铃木公雄：《出土备蓄钱と中世后期の钱币流通》，《史学》61—3·4，1992年。

④ “出土钱货研究会”是以遗址出土的各时代、各种类的钱币为研究对象，以交流研究成果、交换文献情报为目的的学术研究会。会刊《出土钱货》创刊号于1994年4月发行，每年一期。

⑤ 兵库县埋藏钱调查会，永井久美男编：《中世の出土钱——出土钱の调查と分类》，1994年10月。兵库县埋藏钱调查会，永井久美男编：《中世の出土钱补遗Ⅰ》，1996年4月。

易与文化交流的考古见证。宋元漆器在日本一些寺社也有发现。目前，日本学界的研究仅限于各个领域的专题考察，有些还局限在对工艺美术之类的考究上，还未融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整体研究这一大课题之下。到目前为止，涉及 7—14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考古学研究的综合性论述仍要属 1957 年首批日本学者访华团长原田淑人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关系》的演讲，^① 但其下限仅到唐代。其他还可见到小野胜年 1964 年在考古研究所所做的《日唐文化关系中的诸问题》报告（揭载于《考古》1964—12），从制度、宗教、工艺美术三个方面以隋唐律令、伽蓝布局、正仓院藏品为内容做了说明。随着中日双方考古的进展，学术交流的日益加深，使得我们可以利用日本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展示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交流实态。

二 中国学者的研究现状

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于 2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发掘才开始广泛展开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因此，考古学的研究要晚于历史学的研究。早年，有王辑五的《日中交通史》（商

① 原田淑人的演讲汇报了日本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为：1. 日本弥生中期以前（公元前 1 世纪—1 世纪，约当中国汉武帝到汉明帝时期前），接受的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的带有地方性色彩的旧文化，以金属为特色，如铜镜、铜矛等。从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乐浪四郡以后，中国内地的文化开始传入日本。2. 古坟时代（3—6 世纪），在 3 世纪时，倭与魏有交往，曾送给倭女王铜镜百面，但是日本对中国文化还没有全面认识。5、6 世纪时，由于中国人民的一般生活用品和宗教艺术文化开始传入日本，才逐渐使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3. 公元 6 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由古坟进入飞鸟时代，又到奈良时代。日本的佛寺出现了四天王寺式等布局，这些伽蓝配置形式可能受到中国洛阳永宁寺和云岗石窟佛寺建筑的影响。4. 唐文化的传播，使日本、朝鲜等地都出现了许多“小长安”。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